

新时代中国史研究的守正与创新

卜宪群等

【编者按】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这组笔谈，旨在系统梳理新时代以来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学科建设成就。笔谈汇聚该领域8位专家学者，以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心，从具体研究实践出发，深入探讨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等重要议题。学者们既总结了各断代史研究取得的进展，也直面在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挑战与困惑。可以看出，中国史研究正秉持更加自觉的主体意识，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与当代价值，彰显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学术追求与时代担当。期待本次笔谈能够促进学界对中国史学科发展现状的讨论，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 学科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 唯物史观 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刘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昌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1-0039-50

古代史研究与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卜宪群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科建设，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领域、组织管理、服务现实、培养人才上的前进步伐，取得了丰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继承既往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又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基础。

一、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更加稳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这是由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以及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史学家的历史选择、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例外。然而，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淡化、边缘化甚至否定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思潮，严重干扰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向。中国古代史研究究竟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如何继承弘扬？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者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的思想。新时代，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变。

首先，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得到高度肯定。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得出的科学真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还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②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全国历史学界明确提出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③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重要讲话,是对唯物史观科学地位的高度肯定,有力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的一系列核心理论(如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阶级分析方法、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理论等)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运用得到明显加强,尤以社会形态理论为著。

其次,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以及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牵头建立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教学机构联席会议机制,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历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的要求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的重大项目、重要会议以及出版的众多论著,在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最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优良传统得到传承。在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标志性的人物。旗帜鲜明地继承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优秀传统,成为新时代中国古代史学界的共识。例如,2018年,“翦伯赞同志诞辰120周年暨《中国史纲要》出版55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2022年,“纪念郭沫若诞辰130周年暨‘新文科’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乐山召开;2023年,“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侯外庐诞辰120周年学术研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③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页。

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同年，“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这些会议的召开对巩固和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崇高地位有深远影响。

二、学科特色与问题意识更加突出

中国古代史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其中既有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厚重积淀，也有近代学术转型后实证史学取得的丰硕成果，更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谱写的百年辉煌。但是，史学研究的主题总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巩固，使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继承以往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表现出新的特色。

首先，展现出与时代同步的问题意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坚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着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丰富而重要的论断。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鲜明特点就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密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进行实证性研究和理论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研究、“中国特色”的历史内涵研究、“一带一路”研究、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的历史主题，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中国古代史学界对以“新清史”为代表的制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二元对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如“满蒙史观”“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等）进行了深刻揭露与批判，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其次，重视对新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实证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底色，而新资料及其带来的问题意识是推动实证研究发展的强劲动力。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很多重大成果。甲骨文、金文、陶文、简帛的新发现、整理与再整理，为先秦、秦汉史研究增添了极为丰富的材料，相关研究日新月异。隋唐墓志、碑刻、题记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深入整理，为隋唐史研究增添了新资料。宋辽金元、明清的墓志、碑刻、

图像、纸背文书、区域性官私文书、古地图的发现与整理，极大丰富了该时段的研究材料。域外汉籍的系统性整理，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新的资料与新的问题意识。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资料占有与运用上更加丰富多元。

最后，学科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新时代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为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双一流”建设为学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创造了条件，“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为人才培养搭建了高层次平台，冷门绝学学科建设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古典学的建立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新方案。更多新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视角被成功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形象史学（图像史学）即其突出代表之一。在正确的思想引领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新时代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无论是人才培养规模，还是成果质量，以及研究广度，都在中国史一级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新时代，更多青年学子献身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为例，郭沫若、侯外庐、尹达、张政烺、胡厚宣、林甘泉、李学勤、陈高华、陈祖武等一批史学大家曾在此传道授业，为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海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近年来，依托中国历史研究院，该学科形成“教研一体、科教融合”的发展格局，在文化传播、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成绩斐然，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阵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正朝着一流学科的目标稳步迈进。这一令人振奋的局面，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科欣欣向荣的生动缩影。

三、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深厚基础

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立足实际，为回答自身问题而构建的具有民族性、原创性和学理性的知识体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根本性要求。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

术之林。”^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而且为其明确了具体路径、方向与目标。“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②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之一。中国古代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的鲜明特点与扎实进展，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基础。

首先，中国古代史研究为印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提供了实证。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虽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但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并不能替代各国、各民族历史的具体研究过程。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客观历史过程出发，深入考察各国、各民族历史的具体发展道路，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丰硕，在大量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理论创新、观点创新、方法创新都取得重大进展。以笔者从事的秦汉史研究而言，随着简帛材料的大批发现与整理公布，秦汉史研究走向深入。简帛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使我们对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地主阶级封建国家政权的性质认识更加全面，对秦汉乡里基层社会的状况了解更加细致，对秦汉社会各阶级阶层与人群身份的分析更加深入，对秦汉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手段等问题的看法更加准确。秦汉史研究朝气蓬勃，为认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早期发展道路提供了丰厚成果，更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提供了实证。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仅印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且为唯物史观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新材料。例如，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成果，就为唯物史观关于文明起源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则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史实。

其次，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正确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一项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相关的事业，历史学也必须与时代同步前进。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根本方向是：在党的领导下，

^①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②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古代史学科“三大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史学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我们必须从学理上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②中国古代史正是这一独特优势的核心载体。中国古代历史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经验，这些智慧经验往往又以独特的思想体现出来，反映着中国人对政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其中很多极具标识性的概念，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元素。例如，“治理”一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其含义深刻且极富中国特色，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价值。又如“民本”一词早在西周已经萌芽，既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又有政治实践的丰富内容，是中华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除此以外，诸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为政以德、修齐治平、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理念，以及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模式，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是在国家形态的承载下发展的文明，其文明的连续性与国家的连续性相辅相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含的具有当代价值的元素，也正因植根于这种深厚的历史延续性而历久弥新。因此，回答今天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历史中国的角度出发。

最后，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中国大地、体现中国特色，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

① 杜尚泽、颜珂、张晓松等：《“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记“十四五”开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调研》，《人民日报》2021年3月27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而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最能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是能够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继承性与民族性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中国史学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求真求实、经世致用、以人为本、探寻规律的史学基本精神没有变，在体现民族特色、凝聚民族力量、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的作用没有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为我们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必须全面继承。二是能够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原创性与时代性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主体性的关键。我们绝不能跟在西方史学的后面亦步亦趋，盲目照搬他们的理论方法、问题意识、话语体系。而应当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科学阐释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提供历史智慧。三是能够体现系统性与专业性。系统性与专业性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系统性与专业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丰富的体裁形式与话语内涵，很早就形成了自身的史学体系与规范，系统记录并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② 中国古代史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又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关键内容。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丰富源泉，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应当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汲取丰富营养。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globalization waves, the proliferation of unilateralist policies resulting in frequent global governance crises, and the growing trend of extremism and division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ll of which have hin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view of this, it is essential to gradual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shape the development landscape of human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in-depth development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 Keywords 】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ester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human civilization

Upholding Integrity and Innovating in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History for the New Era

Bu Xianqun et al.

【 Abstract 】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delivered on May 17, this journal has specially organized this roundtable discussion, aiming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disciplinary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he roundtable brings together eight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tarting from specific research practices, they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key issues such as the guiding ro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iscovery and collation of new source materials, and breakthroughs in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cholars not only summarize the progress made in

research across various dynastic periods but also squarely address the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currently facing the field. It is evident that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are now advancing with a stronger sense of subjectivity, offering in-dept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reby embodying an academic pursuit and epochal mission rooted in China yet oriented toward the world. We hope that this roundtable will stimulate further discussions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and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for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Keywords 】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uthenticity-Preserving Value of the *Lishi* Manuscript from the Wu Family's Congshutang in the Ming Dynasty: Taking *Shimen Song*, *Xixia Song* and *Fuge Song* as Examples

Wang Tianran Liu Daxiong Liu Li

【 Abstract 】 The *Lishi* (《隶释》) manuscript from the Wu Family's Congshutang (丛书堂) in the Ming Dynasty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transcribed from the complete 27-volume *Lishi* collected by Wu Kuan. Its transcription date is most likely to predate 1554. The Wu manuscript was once in the possession of a bookseller, but only Volumes 1 to 4 have survived; the bookseller subsequently removed the table of contents for Volumes 5 to 27 to pass off the incomplete manuscript as a